

杜甫奔凤翔

凌 迅

“沈端齐终尚，颀洞掇可据。”

这是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初冬，杜甫由长安回奉先途中，预感浩劫巨祸即将爆发而发出的深深忧叹。诗人的忧叹是有现实根据的。果然十一月安禄山以十五万人反于范阳，十二月，攻占东都洛阳，天宝十五载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六月九日破唐潼关二十万守军，大兵迫临京都长安城下，唐王朝处在岌岌可危之中。此时，一贯骄奢淫逸的唐玄宗惊魂落魄，仓皇出逃；太子李亨窜至灵武，再至彭原、凤翔，即位改元，是为肃宗，维系着唐王朝游丝般的命运。在这“地轴为之翻，百川皆乱流”

（《晦日寻崔耿李封》）的危亡时代，杜甫立即奔赴国难，投身到平叛的行列中去。奔赴凤翔，就是最突出的说明。杜甫不仅以自己的精诚，欲拯国家之危，扫妖氛之害，而且还唱出一首首昂扬愤激的宣传平叛、鼓吹收复的战歌，从而划出了他诗歌创作的新时期。

“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

安禄山、史思明是有少数民族血统的边疆大臣，其部将多为居住在当时中国北方境内的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安禄山、史思明的谋反又利用了唐王朝对少数民族的某些歧视政策所造成的民族矛盾，安史之乱所带给整个社会的灾难，超出了唐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范围。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既是地方对中央政权的反叛，也是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背叛。从此，不仅烜赫一时的唐王朝一蹶不振，整个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而且把广大人民推入到水深火热之中。

安史之乱初期，杜甫为了家眷免于兵燹，曾由长安回奉先一次。在逃难的人流中，杜甫由于奔波的疲惫陷于蓬蒿几乎丧生。行至彭衙境内，粮食断绝了，又碰上半月雷雨，杜甫全家“有时经契阔，竟日数里间。野果充糒粮，卑枝成屋椽。”（《彭衙行》）但是杜甫没有为安史之乱带来的灾难所惊倒，也没有为家眷暂时安置在羌村所取得的安逸所羁绊。他听到李亨即位灵武的消息，便踏上了去灵武的征途。

在去灵武的路上，杜甫不幸为安禄山的部队俘获，并被押送到长安。杜甫看到长安到处布满了安禄山的部队，充斥着醉后的狂歌，昔日繁华富贵的景象荡然无存。“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哀江头》）“金鞭折断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曲江头一片荒凉，弃舍下的皇子王孙多被杀戮，幸存者“已经百月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哀王孙》）杜甫厕身于沦陷的长安，尽管“挺节无所污”（《新唐书·艺苑本传》），但是陷落贼手的难言之苦，是无法排解的。他时而跑到曲江岸边，徘徊徘徊，忍泣吞声，甚至爱屋及乌，在怀念远去的唐玄宗的同时，对于自己一

向深恶痛绝的杨贵妃被“赐”自缢，也产生了同情。但杜甫更多的是注目着平叛的战局。他为收复的喜讯而喜，为平叛的失利而悲。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七五六年）十月，宰相房琯自请讨贼，结果大败。“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杜甫沉痛地哀悼战死的将士。但他又希望平叛队伍不要为一时的挫败而丧失信心：

“都人迴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悲陈陶》）他还总结这次失利的教训：“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悲青坂》）杜甫看到，由于集结西陲边疆部队东向讨贼，边疆空虚，芦子关成了扼守的咽喉要道。他惟恐安史叛军乘虚而入，直捣凤翔，动摇了平叛的大本营，于是焦急地说：“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塞芦子》）

唐肃宗至德二载（公元七五七年）正月，安禄山被他儿子安庆绪杀死，唐肃宗由彭原迁至凤翔，平叛战争由被动转向主动，给杜甫增添了信心和力量。他决心逃出长安，奔向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杜甫到达凤翔后，晋见了唐肃宗，肃宗授予他左拾遗的官职，职责是供奉皇帝，谏诤时政得失，推荐贤良。

杜甫忠于职守，力图为国家、社会做出贡献，但却不自觉地陷入了一次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增添了坎坷、风险。唐玄宗与唐肃宗在帝位问题上有尖锐的矛盾。唐玄宗逃至四川，并没有立即退位的意思，他听从房琯的建议，只让太子李亨充当天下兵马元帅，又命李琦、李璣、李璘就地起兵，抗击安史之乱。太子李亨于灵武抢先称帝，造成既成事实，迫使唐玄宗封他为新皇帝。唐肃宗表面尊重元老重臣，任命房琯为宰相，其实同他隔阂很深。陈陶失败，唐肃宗欲重治房琯，因李泌调停，方得幸免。房琯自知君臣不协，凡事取消极态度。唐肃宗再借房琯琴工董庭兰收贿之事处治房琯。杜甫身任谏官，又与房琯是布衣之交，出来为房琯洗污辩诬，同唐肃宗发生激烈争吵。肃宗要把杜甫投入监狱，因张镐为他讲情，才使他无罪获释。

这次斗争给杜甫带来很大不利。收复长安后，跟随唐肃宗的许多人加官进爵，杜甫却原位不动。面对这种处境，杜甫从政不能不十分小心谨慎。“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

（《晚宿左省》）还说到“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春宿左省》）透露了他的紧张心情。即使如此，杜甫也未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唐肃宗乾元（公元七五八年）初，杜甫被踢出朝廷，贬到华阴任司功参军。

离开朝廷，失去“致君”的机会，“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更加渺茫。当他从金光门出发赴华州时，回想昔日追逐唐肃宗的情形，写诗云：

此道昔归顺，西郊胡正烦。
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
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
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

——《至德二载甫自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

一腔悲愤之情，呼之欲出。但这一重大的政治转变，却使杜甫冲破了狭窄的宫廷生活，更加深入地接触到广阔的社会现实。他在华州任职期间，能从当时国计民生出发，册问进士；代别人写了《进灭残寇形势图》，提出了平叛的很好建议。尤其是在从华州回洛阳探家，看到

安史占领区所造成的严重破坏，也看到了唐王朝借平叛强加给人民的灾难，不仅写出了一系列光辉的现实主义诗篇，而且促使他的政治理想有了新的发展。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

从天宝十四载杜甫授右卫胄曹率府参军到弃华州司功参军，整整五年的时间。这是整个国家、社会、民族惨遭蹂躏践踏的阶段。杜甫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坚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不仅为平叛安史之乱输献了自己的精诚，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他能站在时代的顶端，提出应该注意已经或即要萌起的新的社会问题。

杜甫在长安时期深刻揭露的社会危机，首先不是阶级与阶级之间战争的爆发，而是统治阶级内部地方对中央反叛战争的爆发。但是阶级矛盾的激化，却是统治阶级内部战争爆发的大背景。安史之乱爆发了，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转化为全民族对反叛祖国势力的斗争。但是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斗争并没有消失，却在继续发展，甚而表现得相当尖锐。在安史之乱中，人民遭受着安史叛军的杀戮、掠夺、践踏，人民为平息安史之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可是唐王朝统治者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反而借安史之乱对人民横加迫害、摧残，其中突出的是拉丁和催租。由于视野限制，此时杜甫尚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到催租所激起来的阶级义愤，但对于唐王朝不合理的兵役制度所造成的严重阶级对立，却了如指掌。杜甫激励人民抗战的同时，没有回避这一问题，而是把掩饰在平叛旗帜下的阶级斗争现象深刻揭露出来。《石壕吏》就是杜甫这方面的代表作。

唐肃宗借平叛之机抢先占据帝位，实际是一个一心营求巩固个人统治地位的平庸之辈。乾元二载（公元七五九年）三月，九节度使回攻邠城，“不置元帅，但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节度使”。鱼朝恩声名狼藉，又不懂军事，致使六十万大军溃散，收复不久的洛阳岌岌可危，京都长安为之震动。唐王朝统治阶级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却把战争失败的灾难转嫁到人民身上，通过拉丁把人民投入战争的血海。唐王朝征兵无度，抓兵对象不限于青壮年，即使白发苍苍的老人也难以幸免。《石壕吏》就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现实。

安史之乱爆发前，杜甫在长安写了《兵车行》、《前出塞》等著名的反战诗篇。安史之乱一爆发，杜甫对破坏国家统一的反叛战争，立即表示了鲜明的态度。人民对于安史之乱的态度也是十分明朗的。《新婚别》中的新婚妇女形象，就是人民对安史之乱态度的艺术写照。尽管新妇傍晚才娶到婆家，丈夫第二天早晨就得踏上征程，心中许多哀痛和难言之苦，并预料到丈夫此去凶多吉少，可是新妇却置之度外，以家国为重，鼓励丈夫道：“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还坚定地表示：“人事多错舛，与君永相望。”何等的英烈，坚强！杜甫看到人民是支持平叛战争的，但平叛掩盖下对于人民的压迫，不仅会影响平叛战争的进行，甚至会导致阶级与阶级之间战争的爆发，在唐王朝统治阶级宝座下掀起狂波巨澜。杜甫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把这种严重的阶级对立现象揭示出来，以警告统治者。

安史之乱，是从北部边疆浸漫到中原地区的祸患。但是唐王朝安史之乱，不是主要依据官军和人民，而是借助回纥民族上层统治者。回纥，是居住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平叛战争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回纥上层统治者所以参加这次战争，是由于唐肃宗“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女子归回纥”的屈辱许诺。杜甫认

为安史之乱初期，安史势力炽盛，唐朝官军正在集结，借用一下回纥的力量并非不可以，然而必须有正确的方针，绳之以严明的纪律。唐肃宗却一味贪求速胜，不惜一切，不顾后患，特别在回纥上层统治者贪婪的野心彻底暴露，而唐王朝有力量进行平叛战争的情况下，仍然引回纥深入内地，势必将构成新的危难。针对这一严重事实，杜甫在《北征》中说：“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纥。”杜甫以家国为重，在众朝臣谏议失败的情况下，试图打开新的僵局。他以高屋建瓴之势，分析了当时出现的新形势：安史叛军已经陷入灭顶之灾，敌占区的收复指日可待，唐王朝依靠自己的力量完全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但唐肃宗置杜甫的意见于不顾。结果在收复东都时回纥“剽掠三月而止，财物不可胜计。”回纥军再到洛阳时，“恣行残忍，士女惧之，皆登普善寺及白马寺二阁以避之。回纥纵火焚二阁，伤死者万计，累旬火焰不止。”（《旧唐书·回纥传》）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杜甫再一次看到自己的正确意见被否决以后所招致的严重后果，心情沉重，愤恨不已。尽管被踢出了朝廷，但战斗精神未减，他写出了《留花门》的诗篇，批评唐肃宗借用回纥的错误政策。但唐肃宗未能迷途知返，有所省悟，致使“胡尘踰太行，杂种抵京师”，构成了对唐王朝新的严重威胁。加之吐蕃乘西部边疆空虚，不断侵扰内地。这两种力量成为唐后期严重的边患。

唐王朝前期，出现了唐太宗执政时的“贞观之治”，唐玄宗执政时期的“开元盛世”，从而构成了唐王朝的鼎盛时期。但是就在唐玄宗“励精图治”时，地主阶级的腐朽性就充分暴露出来，只不过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唐玄宗到了晚年，无限聚敛，造成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严重的阶级对立；他所发动的开边战争，造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贪恋女色，宠幸外戚宦官，形成了士庶及朝野势力的尖锐斗争。安史之乱爆发前，杜甫已经看到了这些现象，并形诸于诗篇。安史之乱爆发了，唐王朝的腐朽性全部展现出来，使杜甫对于唐玄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在《行次昭陵》诗中批评唐太宗的子孙没有保持住祖先开创的大业，造成了“往者灾犹降，苍生喘未苏”的情况，他感慨地说：“寂寞开国日，流恨满山隅。”事业败坏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杜甫把收拾残局、振兴唐朝的希望寄托于唐肃宗，可是唐肃宗的荒淫、平庸、昏聩并不减于晚年的唐玄宗。杜甫在危难之中，欲挽狂澜，但无补于事。他在《北征》中深深地感叹说：“乾坤满疮痍，忧虞何时毕？”表达了他深厚的忧国忧时、关切国事的情怀。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奔凤翔前后，杜甫写成而流传至今的诗歌共一百一十一题一百一十三首。其中除在凤翔、长安供奉皇帝写的宫廷应酬诗外，多半是感时诗和恨别诗。

宫廷应酬诗，一是供奉皇帝，宫廷生活限制了杜甫的视野，羁绊了杜甫的思想；二是因房琯所遭受的打击，心有余悸，怵惕不安。因此这类诗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多少可取之处。代表这个时期诗歌创作成就的是感时诗和恨别诗。这些诗不仅内容广阔真实，如史诗一般，而且在艺术手法上、现实主义的开拓上，亦有新的发展。

杜甫十分尊重诗歌本身的艺术特点，善于运用形象思维来表达深厚的社会思想。奔凤翔前后的诗作，诗人不仅发扬了前期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而且更加臻于成熟。如这个时期写

的《三吏》、《三别》就是有力的说明。《三吏》、《三别》，完全通过白描的手法，不加雕琢地塑造了一系列感人肺腑的艺术形象，表达了诗人既激励人民抗战又同情人民苦痛的思想。这些诗朴拙而不失之粗劣，质直而又不失之浅薄。对《新婚别》中的新妇，作者以细致的心理描写，深刻揭示了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美好，塑造了一个在家难国危的情况下，抛弃个人一切而以国家为重的光辉形象。这是中国诗史中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之一，在当时起着很大的激励作用。《石壕吏》通过典型环境典型事件的描写，充分表现了石壕吏的残暴肆虐，写出了老妇的纯朴、善良。作者写石壕吏的笔墨极其省俭，却能使其凶煞恶神般的丑恶形象栩栩如生。作者让老妇代表劳动人民把所遭受的压榨和苦痛，石破天惊般的倾吐出来，使这首诗具有撼人心弦的控诉力和感染力。“夜久语声绝，如闻话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这一悲怆的场景，饱含着作者的爱憎情感。

赋比兴，是中国诗歌的传统表现手法，一直影响着中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创作流派。但中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运动到了杜甫时代，赋比兴的手法有了新的发展，而杜甫则是这一发展的代表。《北征》可以说是用诗体写成的奏章，议论多于描写，叙述多于抒情，文字较为典雅，典故较为繁多。但杜甫于《北征》中，决不仅以意取胜，而是巧妙地运用赋比兴的手法，并且把赋比兴紧密地揉合在一起，从而使这洋洋大篇的诗章议论风生，琳琅满目。该诗从“皇帝二载秋”至“忧虞何时毕”，总体为赋，但赋中有比，比中起兴。“乾坤含疮痍”的“疮痍”，把遭受安史之乱后百孔千疮的社会现实揭示出来。这篇长诗有三条思想线索贯穿全篇：一是国家残破的具体描写和作者欲整乾坤的抱负；二是借用回纥兵力所带来的祸患及忧虑；三是杨氏兄妹集团的罪恶及应该汲取的教训。三条线索编织在一起，使议论与抒情结合，赋比兴结合，从而使《北征》仪态万千，汪洋恣肆。

杜甫还把现实主义开拓到更多的体裁中去，如恨别诗。恨别，一直作为文学史传统的题材，篇什之多，浩若烟海，俯拾皆是，但是声远流长的佳作，却是寥若晨星，屈指可数。问题在于，或者这些诗作的作者只沉湎于个人远离家室的缠绵悱恻的感情中，没有多少深厚的社会内容；或者作者无病呻吟，逞绝词丽句以为能。但恨别诗到了杜甫手里，则别开洞天。杜甫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把忧愤时事、关切国难的感情熔铸于恨别诗中，使它的内容宽广，思想深厚，有一条政治思想的激流在篇什中滚动，跳跃。烱炙人口的《春望》就是一例。作者把“国难”与“恨别”联系在一起，由“国破”而恨别，由恨别而念国破，故“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乱，浑然不胜簪”，有着深刻的社会内容。